

毛主席著作藏文版的翻译出版历程

◎ 降边嘉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今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 回顾毛主席著作藏文版翻译出版的历程, 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毛主席著作; 藏文版; 翻译出版

[中图分类号] H214.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0X (2021) 01-0005-07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提出: “新形势下, 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把我们党建设好,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今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 100 周年, 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 回顾毛主席著作藏文版翻译出版的历程, 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藏文翻译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总结和集中概括。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著作, 关心和重视毛主席著作的翻译。由于历史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之前, 毛主席著作没有翻译成藏文。新中国成立之后, 国家正式翻译成藏文的文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 具有临时宪法性质, 是一部重要的政治文献。

新中国成立伊始, 没有专门的翻译部门, 也没有正式的出版机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 1949 年 9 月召开的, 但当时会议文件没有能够翻译成藏文。由于出席会议的藏族人士仅桑吉悦希(又名天宝)一人, 翻译工作也就不显得那么紧要 and 急迫。

新中国刚刚成立后的 1950 年元旦, 毛主席就发出了“进军西藏, 解放西藏”的伟大号令。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 中央责成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①将《共同纲领》翻译成藏文出版, 向全国藏族地区广泛发行。

那时还没有专门的翻译出版机构, 中央民委领导责成民委参事室负责翻译印制。参事室是民委办公厅下属的一个机构。参事室从事涉藏工作的有三位同志: 昂旺格桑、黄明信和曲洛拉(又名李春先), 《共同纲领》就是他们三位共同翻译的。

解放初期,李维汉同志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同时兼任中央民委主任。乌兰夫、刘格平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民委副主任。他们非常关心和重视毛泽东著作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和出版,尤其关心藏文本的翻译。那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处于友好时期,文化方面的交往极为频繁,蒙文可以参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版本,朝鲜文可以参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版本,维、哈文也可以参考前苏联的译本。唯独藏文没有可以借鉴和参考的,必须从头开始,从零起步,困难很多。因此,统战部和民委领导对藏文本的翻译给予了特殊的关怀和重视。

民委参事室翻译的第一部毛泽东著作是《新民主主义论》,于1952年以“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名义出版,没有署译者的名字。译本可能还是出于昂旺格桑、黄明信、曲洛拉之手。

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于1953年成立民族出版社,周总理亲自为民族出版社题写社名,沿用至今,已经历68个春秋。周总理亲自签署,任命萨空了为社长兼总编辑,韩道仁为副社长,李鸿范为副总编。下设蒙、藏、维、哈、朝5个编辑室。其中藏文室副主任为昂旺格桑、黄明信,翻译、编辑有曲洛拉等数人。当时西藏刚刚解放,各项事业尚未开展,公路也没有通车,便从四川、青海、云南和甘肃调来一些人充实藏文室的队伍。

二、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毛主席著作的藏文翻译

为了加强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工作,1955年,经周总理批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局(以下简称民委翻译局),任命朋斯克为局长,下设蒙、藏、唯、哈、朝、彝6个翻译室。任命格桑悦希、刘立千为藏文翻译室副主任。中央民委给翻译局的主要任务是:第一、担任全国性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以及其他重要会议的翻译;第二、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第三、翻译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其中翻译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是翻译局长期的、重要的、经常性的任务。翻译局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是为党的“八大”担任翻译。“八大”结束后,立即组织翻译毛主席著作。

解放初期,经中央批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鉴于藏文室基础薄弱,承担不了这么繁重的任务,于是决定选择性地翻译单行本。藏文室翻译的第一部毛主席著作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完全定稿,反右运动就开始了,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遵照上级指示,藏文室放下一切其他工作,集中全部力量翻译毛主席这部重要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成为国家出版部门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藏文版毛主席著作。

1958年,上级领导指示要集中主要力量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一至三卷,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献礼。同时决定“局、社合并”,即撤销民委翻译局,合并到民族出版社。翻译局藏文室合并到民族出版社,任命格桑悦希、刘立千为藏文室副主任,加上原来的昂旺格桑、黄明信,共有4位副主任。从1953年成立民族出版社,1955年成立民委翻译局,直到198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藏文室始终没有正主任。这4位副主任,加上两个单位的30多位翻译、编辑,是藏文室历史上队伍最强大的时期,可谓兵强马壮。就依靠这支队伍,在“向十周年大庆献礼”的口号鼓舞下,翻译《毛选》一、二、三卷。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翻译三卷《毛选》,翻译编辑力量显然不够,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领导决定从全国各地请专家加强力量。乌兰夫同志指示要调集“精兵强将”,加强翻译队伍。当时从各地聘请的专家有:桑饶嘉

措、才旦夏茸、木格桑旦、木雅贡布、格登，还有来自西北民族学院的两位汉族老师。那一年，即1958年，民族出版社刚刚从国子监搬到和平里，房子面积大了，办公条件也有所改善。二楼东边向阳的办公室全部腾出来，给专家们住。西藏当时正是用人之际，一个也没有请来。民委决定让民委副主任、民族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萨空了担任藏文组组长，聘请喜饶嘉措大师担任学术顾问。

当时，为了翻译出版毛主席著作，藏文组成立了翻译组、审订组和校对组。翻译人员来自全国各地，经历不同，职业不同，方言的差异也很大，很多词汇藏语里没有，需要重新翻译。首先就有一个统一和规范名词术语的问题，搜集和规范词汇的工作量很大，于是又成立了词汇组。

这里还要对校对工作做一点介绍，否则不知道校对工作的重要和困难，很难理解和了解藏文翻译出版工作是在怎样简陋和困难的条件下艰难起步的。藏文书法是一种艺术，字体很多，大体可以分为手写体和印刷体。过去大量的木刻版，都是用印刷体刊印的。印刷体又称“正楷”，正楷很清晰，很规范，但写起来很难，很慢。一般人在书写时，都用手写体，手写体也分为楷书、行书、草书等各种字体。翻译人员习惯手写体，绝大部分同志不会写印刷体。这种情况下，只好由校对组的同志将手写体改写成印刷体。有些人的书法很潦草，很难辨认，转写后还要反复校对。

当时民族印刷厂还在用铅字排版，排字工人都是汉族，他们不懂藏文，只认识30个字母和各种符号。校对组的同志拿着誊写清楚的稿纸，到印刷厂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排字工人拣字丁（铅字）。铅字排印，要用铜模铸造铅字，铜模质量不太好，字号大小不一样，字形也不规范不统一。这也增加了校对和印刷的困难。只能边印刷边改进，不断提高质量。铅字排字很容易出错，排版后打印，按工序，要校对三次，即一校、二校、三校。鉴于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性，还要加两三道工序，做到准确无误，然后打印成清样，送审订组审订。审订之后，再拿到印刷厂修改，排字工人修改之后，校对组的同志再校对、打印。最后，按规定要送领导审定。当时藏文室还没有能够独立审定的领导，组长萨空了非常忙，他也不懂藏文，就组织集体审定。集审组通常由四五个专家组成，集体审稿，集体负责。集审组专家都签字后，才能送印刷厂排版印制。排版以后，在开印之前，校对组还要校对一次，由集审组召集人和校对组组长签字后，才能开印。出了错误，排字工人没有责任，因为他们不懂藏文，只是按原稿拣字排版，责任要由校对承担，因为校对懂藏文，出了错误，至少是责任心不强。从以上简要的叙述，可以看到校对组的工作多么重要，又多么困难，还要承担政治责任。

1959年，在“向十周年大庆献礼”的号召下，翻译人员以“革命加拼命，必要的时候不要命”的精神，日以继夜，加班加点。藏文室也全面加快翻译、审订、校对和印制工作，三卷同时展开。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在翻译出版工作中实现“大跃进”，有的翻译人员为了图快，不用心推敲，出现大量借用汉语词汇的现象。

1959年10月1日下午，中央民委所属的民族文化宫举行隆重的开馆仪式和揭幕仪式，由萨空了主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乌兰夫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及首都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参加，气氛非常热烈和隆重。刚刚翻译完成的民族文字版《毛泽东选集》，在一楼大厅最显著的地方，放在崭新的展柜展出。民族出版社的各民族员工，尤其是藏文室的同志非常高兴。几番辛勤劳动，艰苦努力，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高呼“扎西德勒！”

国庆过后的1959年年底，1960年初，遵照中央首长的指示，民族出版社停业整顿，开展

“质量检查运动”。上级派来一个强大的工作组，督促指导。经过严格检查，藏文版《毛选》一、二、三卷，并没有发现什么政治性的严重错误，但是错译、漏译、译得不准确的地方还是很多的，错别字更多。

三、集中力量翻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60年9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式出版发行。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习。诗人郭沫若填词一首《满江红》，对《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出版，给予高度评价，他热情歌颂：“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1960年，遵照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针对“质量检查运动”后民族出版社的具体情况，民委党组要求出版社要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主要精力做好毛主席著作和反修文章的翻译工作。以乌兰夫为书记的民委党组对毛主席著作的翻译工作十分关心和重视，责成萨空了主任负责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工作。

当时翻译《毛选》四卷和民族出版社的“质量检查运动”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受到当时“左”的错误思潮的干扰，从领导到普通翻译人员，人人谨小慎微。体现在翻译出版工作中，就是直译、硬译，不顾民族语言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大量借用汉语词汇、采用汉语的表达方式。各语种之间还互相攀比，好像借词越多越好。结果翻译出来的东西，群众看不懂，专家学者不满意，批评民族出版社翻译的东西是“汉语式的藏语”“和平里藏语”“汉语式的维吾尔语”“汉语式的蒙古语”……。有人向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反映情况，提出批评。

为了提高毛主席著作的整体翻译水平，经民委党组批准，民族出版社召开了“毛主席著作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出版座谈会”，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次会议在萨空了主任亲自主持下，从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初，先后开了4个多月。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由中央领导、民委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就翻译毛主席著作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报告，会议在民族文化宫主楼举行。田家英、陈昌浩、姜椿芳等领导同志讲话。他们从宏观上、理论上阐述了翻译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性。会议的第二阶段，请专家进行专题指导，回答翻译人员提出的疑难问题。在请来的专家当中，有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吕叔湘、周有光、朱德熙等人，还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翻译家和语言学家，他们都是国内最杰出的语言学家。专家们从毛主席著作的特点来分析汉语文的结构和特点，然后返回来进一步阐述毛主席著作的特点，讲解毛主席语言的风格和特点，讲汉语文与外文、少数民族语文的不同特点。民族语文翻译人员也就翻译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向专家们请教。

召开这样的座谈会，认真地、全面地、深入地讨论毛主席著作翻译工作中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它不仅对做好毛主席著作的翻译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使民族出版社的翻译工作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对于提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整体水平，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事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多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翻译界的权威出席会议，作报告，发表讲话，介绍他们的先进经验，这对民族出版社的编译人员来说受益匪浅。会议之后，藏文室根据会议精神，以及在会上所学到的知识，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藏文稿作了全面审定。多吉杰博老师通读全书，其他几位年轻的同志核对汉文，以实际行动落实会议精神。

1962年底1963年初,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推敲,修改润色,藏文室同志普遍觉得翻译得比较准确、内容上没有错误,语言比较流畅,在当时条件下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可以出版了。但是,鉴于“质量检查运动”的深刻教训,民族出版社领导和民委领导还是不太放心,决定从地方上抽调一些专家学者,组成审定小组,由萨空了任组长,德林、扎西泽仁、彭哲任副组长。此外,还请来了著名的藏族学者霍康色和桑热嘉措,一位是拉萨的大贵族、大学者,另一位是青海省教育厅副厅长、全国政协委员,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藏文室由刘立千、多吉杰博、王承昆和降边嘉措参加,共同进行集体审稿,由多吉杰博老师执笔。萨主任明确提出要集思广益,精益求精。

大家做得非常认真。那时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用铅字排印,打出十几份长条样,每人一份,先做准备,用汉文和藏文仔细核对,看有没有错误。扎西泽仁是四川省甘孜州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彭哲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他们是中共党员,都是学者型的领导,对汉藏文都有很高的造诣,主要负责政治上把关,看有没有翻译错误的地方,尤其是原则性的错误,要保证政治上有没有错译和漏译,解决“信”的问题。

霍康色和桑热嘉措代表两个方言区,一个不懂汉文,一个懂一点,但懂得不多。他们负责阅读藏文稿子,他们不懂的地方,或者认为不通顺的地方,就说明有问题,提出来讨论并加以修改,主要解决“达”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润色,使之通顺流畅,解决一个“雅”的问题。使译文尽可能准确地表达毛主席著作的语义、逻辑和风格,使信、达、雅达到尽可能统一。从1963年下半年到1964年初,共审订了半年多。

在这期间,还将译稿排印成清样,征求班禅大师、喜饶嘉措大师、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降央伯姆、阿旺嘉措、德格色·格桑旺堆、才旦夏茸等民族宗教界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并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修改。

应该说,藏文室的同志是做得很认真的,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央民委和民族出版社领导非常关心和重视,尤其是萨主任,一直亲自抓。请来精兵强将,经过反复修改润色,大家认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译文已经比较完善,也很难再提高,正如陈昌浩所说,“达到现有的最高水平就可以了”,请求批准正式出版发行。然后以现有人马为基础,重新翻译修订前三卷。但民族出版社领导依然不放心,让同志们继续加工修订,做到“精益求精”“万无一失”。

就在这个时候,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四清”运动。民族出版社翻译毛主席著作的工作不得不停下来,集中精力搞“四清”运动。从1960年10月开始进行翻译,直到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藏文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未能出版。

四、突击出版“红宝书”

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到了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在全国上下展开了。根据上级指示,民族出版社集中力量翻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以及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

当时,惟有藏文版《毛选》尚未出版,上级指示尽快出版。1967年春天,藏文室的同志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在过去译稿的基础上,又做了全面的修改。这次修改,有两个特点,第一,使译文尽量口语化、通俗化、大众化;第二,决定向现代汉语学习,以毛主席原著为典范,

使用标点符号。

修改后,经国务院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批准,决定正式出版藏文版《毛选》。民族印刷厂的工人同志也怀着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深厚感情和高度积极性,日夜加班,以最好的质量、最快的速度印制。这便是《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藏文第一版。一下子印了几十万套,向全国藏族地区发行。

1968年,民族出版社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抓的第一件业务工作就是翻译出版毛主席著作。军管会从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请了一些藏族工农兵代表和翻译工作者,对《毛泽东选集》藏文版进行全面修订。1969年9月,当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时,《毛泽东选集》藏文版一至四卷修订本正式出版,向全国藏区发行。

接着军管会又组织翻译、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汇编》^②《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③,以及《毛主席著作选读本》。《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又分“甲种本”和“乙种本”两种不同的版本。甲种本内容多一些,供县团级以上干部和知识分子阅读;乙种本供基层干部和广大的工农兵学习。

百万翻身农奴和广大藏族人民无限热爱毛主席,学习的积极性很高,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汇编》的发行量,超过了100万册。按人口比例,这发行量在全国是第一的。这反映了藏族人民对毛主席、共产党和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的无限热爱。当时,就藏文室的同志来讲,确实是一片真诚、满腔热情,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和敬仰的心情来从事翻译出版工作的。

为翻译《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以及各种不同的汇编本和选读本,藏文室和全国藏区的翻译工作者,确实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满腔的热忱、无限的忠心。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从1960年汉文本正式出版后,即于1960年10月开始翻译,到1967年正式出版,1969年又修订再版,用了9年的时间,几乎集中和调动了全国藏族地区从事藏语文翻译的所有专家和优秀人才,还有不少来自基层的工农兵代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应该说,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那时没有稿酬,不评职称,也就是说,没有名、没有利。没有加班费,只有一个夜餐费。夜餐费也不能随便领取,规定加班到夜里11点后才能够吃夜餐。在那种情况下,广大的翻译出版工作者表现出一种高尚的奉献精神和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在“九大”精神的鼓舞下,当时又印了十多万套《毛泽东选集》藏文版。按藏区的人口比例,印数应该说是相当多了。这不但促进了藏族地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藏语文的普及和运用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很多人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学习、掌握藏语文的基本教材。通过毛主席著作藏文版的翻译、出版,极大地丰富了藏语的现代词汇,增强了藏语的表达能力,对藏语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公开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遵照上级指示,藏文室又组织力量翻译,于1980年正式出版。

从1956年民委翻译局机构搭建完成,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翻译毛主席著作,到1980年翻译出版第五卷,历时24年。所有公开出版发行的毛主席著作,全部都翻译成藏文版了。在藏文翻译出版事业的历史上,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五、翻译《毛主席诗词》

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七律二首《送瘟神》,《红旗》杂志立即予以转载,藏文室正在翻译《红旗》杂志,就这样开始了毛泽东诗词的翻译。

当时北京的藏族干部也不多,主要是民族学院藏文教研室的老师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组的翻译。翻译人员把稿子拿去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很认真地看,并提出修改意见,播音员还当场朗读,看顺口不顺口。

这两首七律《送瘟神》是藏文翻译的第一组毛主席诗词。《红旗》出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组播发了,民族学院的老师把它们作为藏语文教学的教材,发给学生们学习。社会上的反映还是不错的,社领导也表示满意,这使同志们受到很大鼓舞。

1969年,中央决定召开“九大”,于是,军管会指示要集中力量翻译毛主席诗词,向“九大”献礼!藏文室综合各方面意见,对《毛主席诗词》的译稿作了全面修订。这37首诗,差不多翻译了两年多,打印了两次讨论稿,征求了几个地区、几千人的意见。当时没有什么可借鉴、可参考的,一切从头做起,从零开始。总之,为翻译毛主席诗词,翻译人员下了很大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毛主席诗词》藏文版,用藏、汉两种文字对照形式,在1969年“九大”前夕正式出版了。

“向‘九大’献礼”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一项极其光荣、又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一次性用汉、藏对照,印制了100万册,向全国藏区发行。100万,在当时全国的藏族人口只有400万左右,平均4个人一本。在藏文出版的历史上,创造了新的记录。为向广大藏族同胞介绍、宣传毛主席诗词,发挥了重要作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广大藏族读者阅读的依然是1969年的译文,至今没有出现新的译本。聊以自慰的是,我们的译文,还是有生命力的!

注 释:

①这里的“中央民委”即“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简称。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49年10月22日成立,1954年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1970年被撤消,1978年恢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简称国家民委,此后一直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②“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③《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即《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EB/OL]. (2013-12-27) [2021-01-07].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227/c40531-23954508-4.html>.

作者简介:

降边嘉措,男,藏族,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藏族文学。

(责任编辑:李佳凝)